

中國電影家列傳

(三)

中国影家列传

第三集

中国电影家协会
电影史研究部
编纂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96623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4 北京

996623

中国影家列传 (第三集)

中国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5\frac{5}{8}$ 字数: 340,000

1984年6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3,000册

统一书号: 8061·2052 定价: (平) 1.90元

(纸精) 2.40元

撰 稿 人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云缦	王光恒	王任殷	王家龙	少舟
史东明	艾静	刘小云	冯麟	仲卫杰
孙冕	杨国还	李文斌	李方钧	肖慧琴
陈子伶	苟煜升	孙海涛	张荣仁	周少峰
胡小平	胡昶	郭聿慧	洪平	姚锦
晓若	黎之彦	阎敏军	高为人	高歌今
曹积三	黄恽	章柏青	彭成梁	韵森
薛赐夫	颜久石	廖炜		

编 辑 者

陈野(召集人) 少舟 王云缦 阎敏军

图片资料 李小燕

目 录

丁 峤	(1)
丁达明	(7)
于 敏	(12)
于彦夫	(20)
广布道尔基	(28)
马 烽	(31)
马守清	(38)
王 炎	(43)
王 滨	(52)
王为一	(58)
王兴文	(67)
王家乙	(70)
王春泉	(80)
王启民	(84)
王桂枝	(90)
王 阡西	(95)
王震之	(98)
尹一青	(102)
尹广文	(107)
尹升山	(111)

方 徨	(116)
方为策	(121)
车 明	(124)
田 烈	(129)
包 杰	(135)
卢 淦	(138)
卢 珏	(143)
史 进	(149)
史维君	(157)
刘 迟	(162)
刘国权	(169)
刘学尧	(174)
纪 叶	(178)
朱文顺	(186)
庞学勤	(189)
伊 琳	(199)
向隽殊	(205)
孙 谦	(211)
严 恭	(217)
苏 里	(223)
苏 怡	(231)
苏 云	(236)
达 奇	(239)
肖 南	(247)
村 里	(252)
李 欣	(259)

李光惠	(262)
李亚林	(266)
李默然	(273)
林杉	(281)
武兆堤	(290)
陈播	(297)
陈文渊	(302)
陈残云	(307)
玛拉沁夫	(312)
吴天	(316)
吴国疆	(322)
林农	(325)
周予	(333)
胡苏	(338)
洪道	(347)
洪藏	(352)
赵伟	(356)
赵心水	(359)
张弦	(363)
张圆	(369)
张天民	(375)
张辛实	(383)
张玉昆	(388)
张棣昌	(394)
郑伯璋	(399)
梁音	(404)

浦 克	(412)
袁乃晨	(418)
袁小平	(421)
徐 渭	(427)
陶 金	(430)
常 彦	(438)
郭 维	(442)
郭振清	(450)
崔超明	(459)
黄 粲	(465)
黄力加	(470)
舒笑言	(474)
彭厚嵘	(477)
董 萍	(480)
雷振邦	(483)



丁 峤

在我国影坛的领导岗位上，丁峤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熟悉电影艺术创作和经营管理的电影事业家。

丁峤，1924年1月出生于湖北汉口。从小性格开朗，勤于学习，爱好戏剧。小学一年级时就参加学校的演出活动，受到老师们的称赞；然而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动荡的战争环境中度过的，曾随家庭到处奔波。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着祖国的大地。十三岁的丁峤，亲眼目睹了侵略者的残暴。国家民族的危难，激起了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和拯救苦难祖国的爱国热情。第二年，他随全家投奔到上海的亲戚家，进了上海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这期间，他认识了地下党的同志，他们经常向他讲革命道理，讲国民党的腐败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激发了他的抗日热情。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他和一些同学发起组织了一个业余读书会，

他被大家推举为读书会的主席。读书会除了学习《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外，也搞些进步的歌咏、戏剧活动。这时，他还看了不少三十年代党领导下的电影工作者拍摄的进步电影，这对他以后投身革命和从事戏剧、电影工作影响很大。

后来，随着苏北抗日形势的发展，上海地下党动员青年学生参加新四军。他响应了这一号召，主动报名参军。那时他才十六岁。在地下交通员的护送下，他从上海到了苏北解放区，经过靖江转黄桥到盐城。解放区火热的斗争生活和崭新的人与人的关系，使他感到新鲜和振奋，迫切地希望学习。组织上了解他的心思，安排他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学习。毕业后，学校考虑到他在戏剧方面的天赋和热情，决定留他在学校文工团当戏剧组长。1942年敌后形势恶化，文工团解散，他被分配到陈毅军长的警卫营当青年队长。1943年战争形势好转，成立了新四军军部文工队，他被调任副队长。随后，军部文工队扩大为文工团，他担任团委委员兼戏剧股长。解放战争开始后，他担任华东野战军文工团第一团副团长，直到上海解放。在这一段部队文艺工作中，他曾导演过《自由万岁》、《前线》、《阴谋》、《俄罗斯人》、《李闯王》、《雷雨》、《白毛女》等名剧。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他刻苦学习文艺理论和表、导演理论，并给文工团、文训班的学员们讲专业课。同时，他也参加一些演出，扮演了一些角色。此外，他还经常到前沿阵地做宣传鼓动工作。在工作和艺术实践中，显露了他的组织才能和艺术才华。

上海解放后，丁峤作为部队文艺工作者，在上海、南京等地做了大量团结地方文艺工作者的工作，结识了许多长期在国统区坚持从事进步文化活动的作家、艺术家、电影导演和演员，和

他们交朋友，向他们宣传党的文艺政策。1950年，由于电影事业发展的需要，调他到中央电影局任副导演。他愉快地服从了党的决定，从此开始了他的电影生涯。

起先，他被派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和许幸之一道拍摄故事片《海上风暴》。通过这部影片的拍摄，他发现作为综合艺术的电影较之于他从前所熟悉的戏剧舞台，不仅场面开阔了，而且在刻画人物上难度更大。接着，他又和张骏祥一道拍了反映现实斗争的纪录影片，初步摸索纪录影片的特点和规律。他细心地从一些导演那里学习电影的基本常识，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这时丁峤非常热爱电影导演这一行，并决心以此做为自己的终身职业。

1952年，丁峤被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任新闻摄影总队副总队长；第二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成立，他任副总编辑；1955年，被任命为新影厂副厂长兼总编辑，全面负责厂里的创作。他有着高度的责任感和很强的事业心，干一行，钻一行。在新闻纪录电影战线工作的二十二个年头里，逐步使自己成为这一方面的行家里手。

新闻纪录电影是形象化的政论，搞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要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政策观念。丁峤从小在革命军队中生活、学习、工作，也养成了对事物敏感、对生活热爱、对同志热情的思想素质。作为创作领导者，他经常生活在创作人员中，一道研究拍摄方案，深入到拍摄现场进行指导。抗美援朝期间，他曾经到过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前沿阵地了解摄影队的拍摄情况，关心摄影师们的工作、生活和思想情况，给同志们以鼓舞。

1959年在人民解放军平息西藏的叛乱中，他又率领一支摄

影队开赴了西藏高原。他是指挥员，又是战士。在和藏族同胞共同生活的日子里，他注意观察他们的风俗习惯和思想感情的变化。在他的具体指导下，摄影队拍摄了大型纪录片《百万农奴站起来》。1962年，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时，他带领了由八一厂和新影厂组成的联合摄影队奔赴福建前线。在前沿阵地，他身着军装，和指战员们在一起促膝谈心，及时向摄影师们提出拍摄的具体要求。二十二年中，他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新影的创作人员说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实干家。

在这一段时间里，丁峤除了注重在创作实践中指导创作外，还致力于新闻纪录电影创作的理论研究和探索，曾就新闻纪录电影的特性、真实性等问题，发表过一些专题研究文章，对总结新闻纪录电影的创作经验做过许多建设性的工作。此外，丁峤还参加了许多对外文化交流活动。1957年他曾作为中国电影代表团的团长参加过莱比锡电影节的活动；1964年，他应邀到印度尼西亚出席亚非电影节的盛会，并担任电影节的评选委员会委员；1965年，他以电影专家的身份到越南讲学。1956年，国际著名的纪录电影大师尤里斯·伊文思来到中国，任新影厂顾问。丁峤与伊文思朝夕相处，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和深厚的友谊。

在新影任职期间，丁峤还积极参加电影界的各项活动，并曾担任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以及《电影艺术》杂志（原名为《中国电影》）的编委等职。

十年动乱时期，丁峤也遭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特别是在1974年他被调任北京电影制片厂负责人以后，受到更为严重的打击和迫害。1975年，围绕着电影《海霞》的创作问题，“四人帮”及其在文化部的党羽威逼他去整导演谢铁骊和摄影师

钱江。他敏锐地感到他们的目的不是针对一部影片，而是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和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于是，他和“四人帮”及其在文化部的党羽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坚定性。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丁峤就任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他一方面负责电影系统清查“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工作；另一方面，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恢复和发展遭到“四人帮”惨重破坏的电影创作、生产上。

根据党中央及文化部的指示精神，他组织一些同志复审了被“四人帮”禁锢的解放后十七年中拍摄的六百多部影片。在这项工作中，他不辞辛苦，亲自作调查研究，审看影片，经过两年多的时间，推倒了“四人帮”对许多影片的污蔑不实之词，解放了几乎全部被封禁的各类影片，为影片和有关创作人员恢复了名誉。

与此同时，他抓的第二件大事是组织向建国三十周年献礼的各类影片的创作和拍摄工作。他和副局长张骏祥一道负责了献礼影片的筹备工作。在创作问题上，他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励创作人员大胆解放思想，冲破“四人帮”设置的重重禁区，深入开拓题材，追求风格、样式的多样化。他经常到第一线和创作人员交换意见，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他平等待人，尊重艺术家的劳动，因此得到创作人员的支持和信赖。对新涌现出来的青年创作者他也给予了热情的支持。

在他分管的电影外事工作中，也做了大量工作。1978年他曾率领中国电影代表团访问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80年11月，随以王阑西为团长、张骏祥为副团长的中国电影代表团出访过美国和日本，并担任这个代表团的秘书长，为增进同各



丁峤与荣获文化部1981年优秀儿童片奖
的代表在一起

国人民和电影工作者的友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近年来，丁峤的工作担子较重，但他仍能注意研究电影理论界的新课题，曾就电影的创新和民族化等问题进行探讨，并发表了专题性的论文。

在1979年10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和第四届中国电影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丁峤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和中国电影家协会常务理事。1982年5月，丁峤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和民族文化工作。

（李文斌）



丁 达 明

丁达明，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经理，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党委副书记。

1916年10月，丁达明生于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九子园村一个贫农的家庭，祖上历代务农。他从小参加劳动，七、八岁时就帮助父亲割稻、放牛、种地。在艰难中，丁达明念完了小学。十四岁那年，父亲去世，他只好辍学在家务农。直到十七岁时，他才得到在南洋做工的叔叔的帮助，进入文昌县中学习。丁达明喜爱文学和绘画。在县中，他写了一篇作文《文昌江畔》，深受师生好评。由于得到语文老师的鼓励，1935年他和几个同学结伴离开海南，到南京继续求学。从农村进入大城市，丁达明的视野开阔了，思想活跃了，他开始结识进步朋友，接触进步书籍，慢慢地懂得了什么叫剥削，什么叫革命。当时正值抗战爆发前夕，中国处于危亡关头，丁达明一边学习，一边积极参

加南京学联的抗日救国活动。“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丁达明归返家乡，以画笔为武器，参加抗日宣传活动。这时，他从一家杂志上看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招生简章，决定奔赴延安。1938年3月初，他与几个同学，历尽艰辛，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西安吴堡“青训班”学习，之后，进入延安抗大，从此参加了革命队伍。

丁达明在抗大结业后，被分配到新四军四师政治部任宣传干事。不久，又调至新四军军部鲁迅艺术工作团任美术组副组长。1944年，苏北画报社成立，丁达明任该社美术编辑。这一时期，他一边战斗，一边作画，创作了一批以抗战为内容的木刻。抗战胜利后，丁达明随军北上，参加创办《东北画报》，任美术编辑。1949年，广州解放，他受党派遣，接管广东省艺专。1951年春，他被调至中央电影局中南影片经理公司华南分公司任副经理。三年后，又调至中南区电影公司任经理。就这样，丁达明走上了电影发行的工作岗位。

丁达明在华南、中南工作期间，主要致力于新中国的电影发行事业的筹建工作。解放伊始，人民政府虽然接管了敌伪经营的影院，但是，整个电影市场仍然充斥着资本主义国家和私营厂出品的影片。国营厂出品的故事影片以及反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纪录影片在市场上数量尚少，处于劣势地位。当时在中南地区的丁达明和洪藏同志一起，依靠党的政策，领导电影发行部门的职工，通过统一排映，扩大宣传，举办“新片展览月”、“抗美援朝电影宣传月”等多种活动，扩大了国产影片的影响，改变了电影市场的面貌。在此期间，丁达明的足迹遍及华南、中南所属各省，并建立、健全了各级电影发行机构。

丁达明于1954年调到北京任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宣传处长，

1957年被任命为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副经理。从此，丁达明参与了全国电影发行事业的领导工作。

丁达明来自农村，他比较了解农民对电影的要求。他一路上全国电影发行工作的领导岗位，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农村，着眼于广大农民看懂看好电影的问题。为此，他十分重视电影的宣传工作。他经常强调电影宣传工作的思想性与通俗化，要求电影宣传品的文字必须通俗易懂。他善于发现典型，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六十年代，他及时肯定和推广了基层电影发行部门做好电影宣传工作的“三步骤”经验，即“映前宣传，映间解说，映后搜集反映”，使这一经验在电影发行放映系统普遍开花结果。在他的主持下，中影公司又在北京、延边、福州和其他几个地方连续举办了农村电影宣传工作的现场会议，总结推广了河北三姐妹电影放映队的三镜头幻灯宣传经验，以及用口译配音和涂磁录音帮助各族人民看懂电影的经验。此后，农村三镜头幻灯宣传工作和少数民族语配音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开展了起来。

我国疆域辽阔，幅员广大，特别在农村，要使几亿农民都看到电影，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丁达明一直在寻求解决这个问题。六十年代初，山东平度县、浙江淳安县以放映队为单位，合理划定服务地区、合理设置放映点、合理安排各类放映点的映出次数、合理规定收费标准为主要内容的“规划放映”经验，引起了丁达明的重视。他抓住这两个县的典型经验，先后在华东、中南、西南和东北四个大区召开了农村电影普及工作会议，加以推广，成效显著。之后，全国农村放映点大幅度增加，大大地加快了电影的普及的深度和广度。

在十年动乱期间，丁达明被打成黑线人物，备受摧残。他